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笑话”及其对特权阶层的批评

李斯霞[1]， 冯小伟[2]

(1. 广东金融学院 公管系、思政部，广东 广州 510631；2. 郑州市睿典教育培训中心 行政部，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苏联社会的“停滞”在客观上为政治笑话的盛行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深厚的社会土壤。勃列日涅夫时期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政治笑话批评的重要对象，研究这一现象，可窥见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弊端，更好地理解苏联解体以及苏共败亡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国家与社会关系；特权阶层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1-0062-07

“Political Jokes” During the Reign of Brezhnev and Its Criticism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LI Sixia[1]， FENG Xiaowei[2]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
2.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Ruidian Education & Training Center，Zhengzhou，Henan 450052，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Jokes”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reign of Brezhnev.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stagnation” of Soviet society，which objectively provides various themes and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prevailing of “Political Jokes”. The huge privileged class during the reign of Brezhnev became an important object of criticism naturally. Through a deep analysis of the criticism，we can find out the drawback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which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etter.

Key words: political joke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privileged class

所谓政治笑话，是指采用一种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人物等进行嘲讽的口头文化作品。它具有讽刺性、私下传播的隐蔽性以及集体认同感等特点。从本质上讲，它属于“政治言论的符号空间里的边缘层”。[1] 苏联的政治笑话不仅数量多，语言表达尖刻、犀利，且内容涵盖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反映民众政治心态、表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艺术表达形式。苏联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形成了社会高度国家化、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模式，国家对社会控制得相当严苛；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国家相对放松了对社会的强力控制，

收稿日期：2015-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解体过程的俄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号：14ZDB062)

作者简介：李斯霞(1978-)，女，广东兴宁人，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原理。

但是苏联社会并没有因此得到培育，反而开始进入了停滞和衰退的状态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政治笑话的出现和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苏联由此进入了“政治笑话最强盛的时期”，[2](p97) 政治笑话成为影响苏联政治生活的“微弱却普遍的”、“持有异议的”、“隐蔽的、不公开的抗议形式”。[3] 在这里，笔者仅概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盛行的原因及特征，并对这一时期政治笑话对官僚特权阶层的批评作一分析，以助于人们窥见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弊端，更好地理解苏共败亡的原因。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笑话：盛行的原因与特征

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

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就在客观上为政治笑话的盛行和传播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和深厚的社会土壤。在勃列日涅夫长达 18 年的统治下，虽然苏联社会呈现出表面上的稳定，却潜藏着停滞的本质。[4] 这种停滞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例如，老人政治、官员贪污腐化、民众排队购物、思想僵化等，这些都成为了政治笑话嘲讽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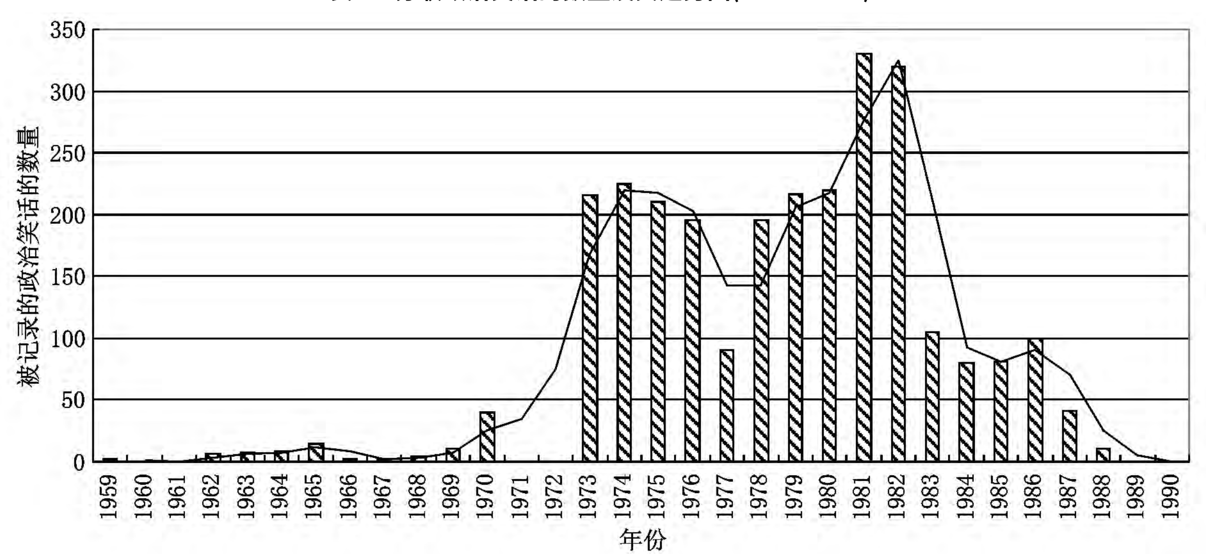
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尽管并没有改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5] 但毕竟出现了一定缓和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笑话之类的批评、嘲讽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为政治笑话的盛行提供了政治空间。

第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理论上建构出来的民众的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这必然在苏联民众中间产生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冷漠心态。应当说，这种心态为这一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盛行提供了动力。

上述原因造就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盛行，而盛行的政治笑话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相较于苏联其他历史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笑话数量比较多。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亚当斯在《俄国的微弱革命：20 世纪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一书中，一共收集了 794 则苏联政治笑话，其中，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笑话为 211 则，占 26.5%。爱沙尼亚学者 Arvo Krikmann 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苏联的加盟国爱沙尼亚的政治笑话的研究，也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的庞大数量（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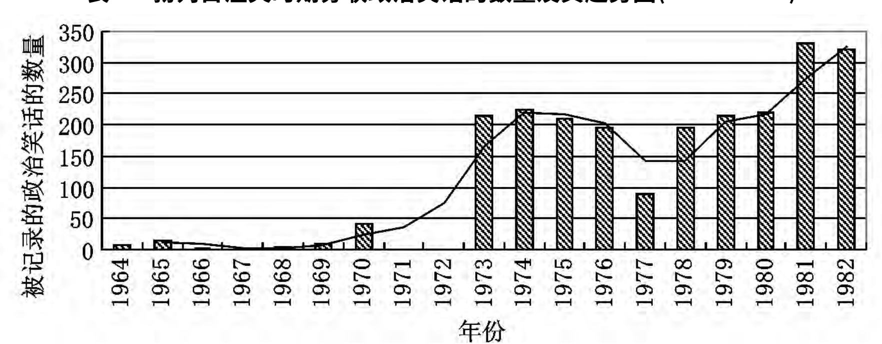
表 1　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及其趋势图（1959－1990）



资料来源：Arvo Krikmann，Jokes in Soviet Estonia，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Vol. 43，2009，pp. 43－66.

第二，勃列日涅夫前后执政苏联共计 18 年，在其执政初期，苏联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的数量并不是太多，但从 1973 年开始，政治笑话呈现出迸发态势，并大量地在社会中流传开来。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去世（见表 2）。有学者也明确指出：“政治笑话的数量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达到顶峰。”[6](p15)

表 2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及其趋势图(1964 –1982)



资料来源: 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 –66.

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斯大林时期一则政治笑话传遍莫斯科市的大街小巷需要大概“两到三天内”。[7](p3) 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则新的政治笑话从出现到传遍整个城市只需要极短的时间。在 1970 年代,克格勃曾做过一项关于政治笑话“流传速度”的实验,其结论认为,“一则政治笑话在六到八小时左右便会传遍一座如莫斯科市大小的城市”。[8](p102)

二、作为一种批评工具的政治笑话: 对官僚特权阶层的批评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的盛行本身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笑话作为民众的一种批评工具,应当说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应用。而作为一种批评工具的政治笑话,其批评的对象自然包括苏联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人物等方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无论从成员数量还是内部特征来看,它都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存在的,与工人、农民存在着明显的利益的分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据俄国学者的保守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大约有 50 –70 万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有 300 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9](p571) 可以说,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无疑成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笑话所嘲讽、批评的主要对象。

具体来看,围绕这一阶层的政治笑话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官员职务终身制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令官员心慌不已的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他吸取了赫鲁晓夫的教训,采取的第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废除了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并把“稳定”的原则贯彻到苏联的干部体制上,从而恢复了苏联传统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如果说赫鲁晓夫给苏联骨干带来了生命安全这一礼物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保证了他们职务的安全。苏联的高级官员不是逐步消失,而是死在任上。”[10](p36) 当时的苏联民众在没有其他政治渠道可以表达舆情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制造并流传各种政治笑话来讽刺这个畸形的社会现实:

①“这些天勃列日涅夫每天都有什么安排?”

“上午 9 点: 复活。上午 10 点: 静脉注射早餐。上午 11 点: 为工作餐作准备。上午 12 点: 工作餐。下午 1 点: 卸下奖章。下午 2 点: 被授予新奖章。下午 3—5 点: 休息一下。下午 6 点: 为工作餐作准备。下午 7 点: 工作餐。下午 8 点: 临床死亡。第二天上午 9 点: 复活……”[11](p145)

②一天早晨,有家晨报报道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沉痛地宣告: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长期患重病后没有苏醒过来,但是目前仍在工作。”[12](p313)

上述的两个政治笑话既是针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也讽刺了当时的官员职务终身制,但更侧重于讽刺职务终身制。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是一个相当平庸的国家领导人,他能够出任苏联最高领导职务是出自政治平衡的需要,因此,当时苏联社会上关于他本人的政治笑话在数量上是相当多的。但是,由于

官员职务终身制也符合官员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的嘲讽不仅不会去认真地反思，更不会对官员职务终身制进行修正。

在 1966 年召开的苏共 23 大上，勃列日涅夫就毫不掩饰地指出：“近年来所实行的对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的频繁地改建和改组，对挑选、提拔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通常，跟着这些做法一起发生的，就是没有道理地重新安置干部和更换干部，使工作人员因而缺乏信心，妨碍了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不负责任提供了土壤。”[13](p122) 然而，这种停滞、凝固的干部政策，势必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14](p101) 社会上有很多政治笑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譬如：

苏斯洛夫临终前，政治局委员围在他的床边。他们在等着医生宣布苏斯洛夫的死亡。然而，沉默良久，医生终于开口说道：“没办法啊，没有人能顶得住。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老年化。”

“不对，”勃列日涅夫说道，“我们主要的敌人是缺乏自律。大家看看，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但苏斯洛夫还没来”。[15]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职务终身制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历次苏共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比例之高，超出了人们对选举政治的预期。即使是在苏共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比例最低的二十三大上，也竟高达 79.4%。对此，原苏联学者格·阿·阿尔巴托夫就明确指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 15 - 20 年之久。”[16](p309) 而为了贯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保证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苏联当局实行了“一套很高超的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譬如，“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应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就把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之后又推荐他(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当大使”。[16](p309) 这种超常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必然导致干部队伍出现老龄化，到最后又必然会形成“老人治国”甚至是“病夫治国”的奇特局面。有数据显示，到 1980 年，苏联权力机构的大部分组成人员的年龄都已超七十岁，而在“政治局七十岁以上的人比六十岁和六十岁以下的人多六倍，部长会议主席团则多四倍”。[10](p24)

于是，在社会上开始流传有关“老人之家”之类的政治笑话了。

①“世界上最有趣的老人之家在哪里?”

“克里姆林宫。”[11](p116)

②“有 40 颗牙齿和 4 条腿的是什么?”

“鳄鱼。”

“那有 4 颗牙齿和 40 条腿的是什么?”

“苏共政治局。”[11](p116)

上述的政治笑话都明显地揭露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员职务终身制的畸形国家权力分配，它的形成引起了社会民众的普遍不满，于是当社会不足以强大到运用其他形式表达不满的情况下便以“政治笑话”的形式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同一批人长期把持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极其容易导致干部队伍的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极其容易形成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这样，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体系不仅难以输进新鲜的血液，从而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也必然导致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下降。广大民众对此深感不满，但也只能编织政治笑话的方式来表达。例如：

“1982 年我们有什么梦想?”

“苏联政权已经 65 岁了，或许应该退休了。”[11](p144)

(二) 任命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命制是苏联干部制度最大的特点，而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与任用则实行“绝对的任命制”。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就明确指出：“挑选干部、组织工作和检查执行情况，还有党的生活中的几乎一切日常问题，基本上都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范围。”[17](p50) 由于党的总书记领导着

中央书记处,因此,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就掌控着高级领导干部的前途和命运。例如,波德戈尔内曾任苏联最高主席团主席,是乌克兰籍的苏联著名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然而在 1977 年,波德戈尔内却因"健康原因"被勃列日涅夫解职。本来,苏联的官员职务是终身制的,一般不会以"健康与否"被开除。但是,波德戈尔内却偏偏因这个理由丢掉职务,于是社会注意到了这个特殊事件。人们开始以此事件来编织政治笑话,并对苏联的干部制度和勃列日涅夫加以嘲讽:

"波德戈尔内为什么被开除了?"

"因为他在勃列日涅夫的生日上赞扬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你现在 70 岁,看起来比 60 岁的苏联政权还要好。'"[11](p144)

笑话中的波德戈尔内仅仅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丢掉了高级职务,其中的文学夸张手法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勃列日涅夫拥有的自上而下的任免权力是非常巨大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与"个人集权"的结合,必然导致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任人唯亲。勃列日涅夫可谓是任人唯亲作风的典型代表。有学者就曾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14](p103) 在勃列日涅夫以"逼宫"的方式上台之后,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聂伯罗帮"。① 他不仅把自己的亲信、心腹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而且他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毫不吝啬。例如,他的女婿、儿子、弟弟都是在他的权力荫庇之下而平步青云的。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干部任命上的不正之风自上而下地传染到全国,干部要提拔主要靠关系,靠个人的忠诚,靠亲属的条件,而不靠业务和政治才能"。[17](p35) 在这种氛围影响下,干部任命体制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特权继承制":"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16](p310)

下面一则政治笑话就是对这种"特权继承制"的批评:

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

"爷爷,我长大后能当上将军吗?"

"当然能。"

"那我能当上元帅吗?"

"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11](p107)

这样一种任人唯亲的任命制,必然导致执政能力的下降,诚如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领导人的水平直线下降,因为现有的政治机制没有保障真正良性的自然淘汰。实行的是某种'反向的自然淘汰',提拔了一些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16](p319) 勃列日涅夫是平庸的人,他主导的政策提拔了"一批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无所作为自然也就无所建树,这直接导致苏联社会进入停滞时期。

(三) 特权制度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强化"官员等级制度",不断扩大特权阶层,努力在制度上保证官员特权的稳定性。在这一制度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各级党政干部开始从"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16](p313) 所引发的官场震荡中逐渐缓过神来,他们开始享受"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享受高生活水平和各种特权"。[16](p309) 官僚特权制度"先是各共和国及其领导人,接着是州和市,某些方面是区,甚至是工厂和农庄都纷纷效仿"。[16](p340) 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民众,并且越来越出格,广大民众开始质问"我们的生活如何?"下面二则政治笑话就反映了这一点。

①"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一切都很富足",党的宣传员说。

"那我们如何呢?"大厅里有人问道。[11](p108)

---

① "第聂伯罗帮"是以勃列日涅夫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政治帮派,因勃列日涅夫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而命名。在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把一些老相识、老部下相继调进中央,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从而形成了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

②“为什么不再多买点麝鼠帽?”

“因为麝鼠成算术数级繁殖，但是显贵们却成几何数级增多，现在没有人可以再捕猎到麝鼠了。”[11](p107)

为了平复社会的质疑，苏联的高级领导层不得不寻求其他的谋利之道。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过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遵守了。可是，同时也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发“红包”就是当局想到的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晓的。但是，当局的这一小动作根本没有能够躲开老百姓明亮的眼睛，他们竭尽所能地讽刺着社会的现实，通过政治笑话发泄着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不满。

① 在一次宴会上，主持人站起来祝酒说:“我提议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干杯。但是，我要做些解释。我并不是因为他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项职务有工资。我也不是因为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个职务有第二份工资。我甚至也不是因为他是国家第一元帅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项职务还有第三份工资。我是为他第一个认识到现实状况下靠一份工资难以维持生活而干杯。”[12](p310)

② “不够尺寸的裙子叫什么?”

“叫米尼卡特(短裙)。”

“不够尺寸的小汽车模型呢?”

“叫米妮卡(小汽车)。两种都是时髦货色，虽然东西小，价钱可是大!”

“那我就明白了。一天不干多少活，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就叫米尼斯特(部长)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苏联开始进入停滞年代。民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有时仅仅是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强，但是生产力却受到生产关系的桎梏而得不到解放，需求与生产之间的裂缝日益增大。但这对最高领导层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特权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提前享受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而且是那样地心安理得。一则政治笑话称:

外国人说:“你们喝不到白兰地，真遗憾!”

工人说:“不，我们已经通过政府官员喝到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代表呀!”[18](p3)

在笑话中，虽然工人口头上承认“政府官员”是他们的“代表”，但是，在他们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官员与他们是有着隔天差海的境遇。对于苏联社会出现的官僚特权阶层，前南共联盟中央书记密洛凡·德热拉斯把它看做是一个“新阶级”。他说道:苏共“最大的幻想是: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以及摧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以后，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 1936 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曾宣布‘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及古时传下来的其他阶级事实上是被消灭了，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却形成了”。[19](p33)可见，其时的苏联社会已经分化。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高度不一致，他们利用一切方式实现和维护着特权制度，成为一个自绝于人民群众、高踞于社会之上的自利集团。官僚特权阶级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以国家管理者的姿态出现，所以社会的其他阶层自然而然地将“他们”与“国家”并列，把他们视同为国家。于是，他们的腐败行为就是国家的腐败行为，他们的自私自利被视为是国家从不顾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其他社会阶层对国家、对政府的不满，使国家与社会对立了起来。

三、结语

政治笑话是民众编造的，虽然它们不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确实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现实;它们并不是任意捏造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社会舆论、民情的真实反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停滞不前”客观上为“政治笑话”的滋生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也为其流行提供了合宜的政治空间。由于苏联当局不愿改革，而是致力于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绝对的任命制，从而造成了个人集权的不断扩大和特权阶层的日趋稳定的态势;而民众并没有因这一时期所宣称的“发达社会主义”中得到多少实际的物质利益。因此，这就使得“官僚特权阶层”成为苏联民众表达对政

权的不满和抗议的“靶子”,并通过政治笑话这种大众文化的口头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

在一定意义上,既然政治笑话是一种对政治生活中各种不良现象的不满的表达,那么,对于苏联当局来说,理应从中汲取民意的营养,致力于改革不良的政治生活,从而使政治笑话转化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正能量,增强苏联政治体制的免疫力,进而提高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修复能力。然而,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政治笑话的态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对政治笑话所反映的现实进行反思,更没有据此进行改革,以至于到最后导致了苏联政治生态的恶化,导致了其政治的衰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20]

参考文献:

[1] Elena Sheygal - Placzek. *The World of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ekdot* [J].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 Nos. 3/4(Summer/Fall 2009).

[2]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 - Register* [J].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 1997.

[3] Ben Lewis. *Hammer &tickle* [J]. Prospect Magazine, 20th May 2006—Issue 122.

[4] 郝宇青. “勃列日涅夫稳定”原因论[J]. 历史教学问题, 2005, (4).

[5] 郝宇青. 苏联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论析[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7, (5).

[6] C. Banc(pseudonym) and Alan Dunders, *First Prize: Fifteen Years!* [M]. Cranbury, NJ, 1986.

[7] David Brandenberger. *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 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 [M]. Slavica Publishers, 2009.

[8] Graham, Seth Benedict, *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 - Soviet Anecdote* [D]. thesis, U. of Pittsburgh, 2003.

[9] 阿·尼·萨哈罗夫. 20 世纪俄国史[M]. 莫斯科: ACT 出版社, 1996.

[10] 塞维林·比亚勒. 苏联的稳定和变迁[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11] Bruce Adams. *Tiny Revolutions inRussia: Twentieth - 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 [M]. Routledge Curzon, 2005.

[12] 姜列青. 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3]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二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14] 陆南泉. 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5] Mark Perakh, *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 Russian Oral Jokes* [EB/OL]. http://www.talkreason.org/marperak/jokes/jokes.htm. April 27, 1998.

[16] 格·阿·阿尔巴托夫. 苏联政治内幕: 知情者的见证[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17] 郭春生. 社会政治阶层于苏联剧变——20 世纪 60 - 90 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18]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 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编辑内部资料, 1975.

[19] 密洛凡·德热拉斯.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20] 郝宇青. 制度供给过剩与苏联政治的衰朽[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责任编辑: 郭荣华)